



北京玉河：流淌千年的历史文脉

□ 谈小燕

“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，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。”2014年2月25日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玉河，察看玉河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工作展览和河堤遗址，提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，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，要本着对历史负责、对人民负责的精神，传承历史文脉，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，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、在发展中保护。

历史上漕运和运河文明的珍贵遗存

玉河是通惠河的一段河道，是历史上漕运和运河文明的珍贵遗存，已有700多年的历史。玉河曾经是京城的一道亮丽风景，“金沟河上始通流，海子桥边系客舟。此去江南春水涨，拍天波浪泛轻鸥。”元代著名诗人杨载曾如此描写玉河场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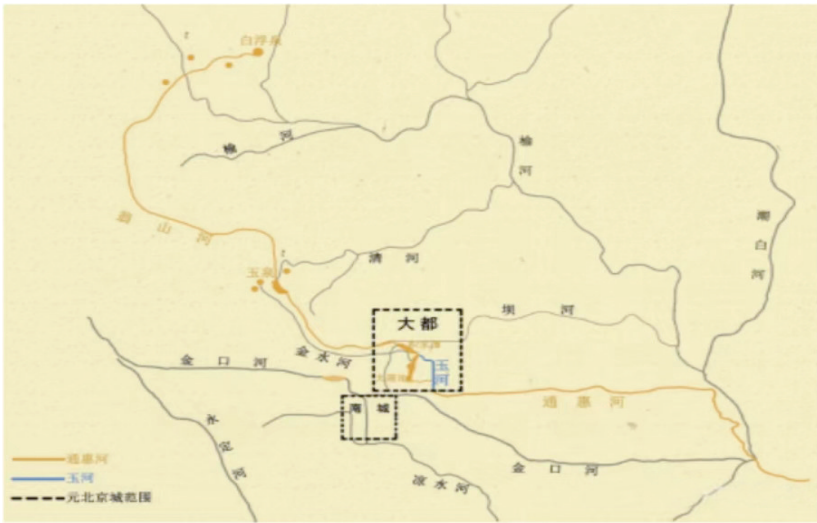
玉河是元大都经济功能的“生命线”。北京历史上的漕运可追溯到一千一百余年前的金朝。蒙古骑兵攻占金都后，郭守敬上言元世祖忽必烈应导西山之泉，用高粱河水系供都城。元迁都至北京时，以什刹海东岸为中轴线修建元大都。为解决元大都的供水和交通运输问题，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年），郭守敬再次上言忽必烈应开凿河道。至元二十九年（1292年）开始开凿玉河，至元三十年（1293年）修建完毕。玉河汇集元大都西北诸泉（昌平白浮神山泉等）至瓮山泊（今颐和园昆明湖）水源。由瓮山泊经长河、高粱河引水至积水潭（今什刹海，即前海、后海、西海）。从积水潭东出万宁桥（也称后门桥）南折至东不压桥（今平安大街），再东进至元大都东皇城墙外（今北河沿大街），后向南出元大都城入护城河（今前三门大街南侧），最后向东经大通桥（今东便门桥）直至通州，全长约82公里。为了管理水流，方便漕运，通惠河主要干线上修建了24座水闸。

通惠河开凿后，漕运码头形成，使得京杭大运河的货运船只可以直接开到

都城里的积水潭码头。因此，元代时期的玉河一带十分热闹繁华。积水潭地区成为元大都的商业中心，米面市、木器市、珠子市、缎子市等大小集市沿积水潭北岸、东岸设立。烟袋斜街一带，旅馆、酒楼、饭馆、茶肆、各种商店等遍布，热闹非凡。在玉河上，浩浩荡荡排船驶行，景象十分壮观。据《元史》记载。忽必烈“过积水潭，见舳舻蔽水，大悦”，亲自命名从万宁桥到通州的河道为“通惠河”。金代时疏通过路河，并修有闸坝。因此金以后，大运河的北段被人们称为“金闸河”。而从万宁桥到金闸河的一段因在都城内，并流经元代的皇城根，故称为“玉河”。

玉河上的万宁桥是北京城内最早的石桥。万宁桥建于元至元二十二年（1285年），最初为木质结构，后改用石砌筑。元代《析津志》记载：“万宁桥在玄武池东，名澄清闸。至元中建，在海子东。至元后复用石重修，虽更名万宁，人惟以海子桥名之。”玄武池是积水潭的别称，海子桥是俗称，万宁桥是官称。据说，“万宁”取“万年永宁，坚固不朽”之意。万宁桥在地安门之北，地安门为明皇城的后门，因此又称后门桥。张次溪在《燕京访古录》中记载：“后门外地安桥下，有石刻三字，曰北京城。”1950年，清挖什刹海，疏通玉河时，在后门桥底下淤泥中，挖出一根四方的清石桩子。长一丈，宽七八寸，在石桩子一面上刻有一只三寸多长的老鼠，下边刻有“北京”两个字。相传是明永乐年间修建北京城时，在此处立的子午线石桩（十二地支，子的属相是鼠）。万宁桥旁设有水闸，用于控制积水潭的东出口。《元一统志》记载：“海子东澄清闸三。”澄清闸共有3座，分别是万宁桥（澄清上闸）、丙寅桥（澄清中闸）、望云桥（澄清下闸）。石拱桥多为闸边桥，即闸体在拱桥桥体的一侧进行建造的桥，澄清上闸东侧的万宁桥就是这种“闸边桥”。万宁桥桥上南北大街贯穿，桥下通惠河东西流过，水陆交汇，成为元大都都城的交通枢纽。万宁桥下的客运码头，成为游人和货物的集散地，逐渐形成了以万宁桥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商贸场所。

玉河在清代称为御河。由于水量减



少以及运输方式发生变化，玉河漕运功能逐渐弱化，河道多次淤塞并被逐渐填埋。明宣德七年（1432年）皇城外扩，将东不压桥以南至长安街河段纳入皇城，玉河只供排水功能使用。嘉靖年间，因修建外城和皇家坛庙等需要大量物资，由巡仓御史吴仲主持再次疏通通惠河，吴仲按照郭守敬的引水路线得以疏通。到清光绪二十六年，通惠河的漕运停运。1956年，随着城市建设，玉河改为暗沟。从至元二十九年（1292年）开凿到1956年改为暗河，玉河流淌了664年。

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相结合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首都规划务必坚持以人为本，坚持可持续发展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，贯通历史现状未来，统筹人口资源环境，让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利用、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。”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》提出“历史河湖水系的保护”，明确玉河作为古代漕运河道，“将御河上段（什刹海—平安大街）予以恢复”，掩埋了半个多世纪的玉河得以重见天日。2014年，京杭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其中玉河北段的万宁桥和东不压桥成为重要的遗产点。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（2016年—2035年）》进一步明

确，构建全覆盖、更完善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。强调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利用，以元代白浮泉引水沿线、通惠河、坝河和白河（今北运河）为保护主线，推动大运河遗产保护利用，全面展示大运河文化魅力。并明确合理确定水面面积，推动历史水系恢复，严格落实河湖管控措施，加强滨水空间建设，营造“六海映日月，八水绕京华”的水系格局。其中通惠河（含玉河）水系就是“八水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2015年，玉河南段水系恢复工程启动。以河道为载体，突出大运河历史文化要素，提高滨水空间开放度、舒适度。营造连续开放、绿荫环绕、人水和谐、鸟语花香、绿荫环绕、人水和谐，让城市留下记忆，让人们记住乡愁。

玉河古道，这条历史悠久的古河以全新的面貌回到北京这座伟大的城市之中，静静地流淌在红墙灰瓦之间，悠悠地荡漾在人民群众欢声笑语之中。玉河重建不但恢复了古都风貌，更重要的是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相结合，历史河道、自然生态与市民生活相得益彰，首都风范、古都风韵、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得以充分体现。水清鱼跃、鸟语花香、绿荫环绕、人水和谐，让城市留下记忆，让人们记住乡愁。

如何把握“大思政课”建设的关键环节

□ 盖逸馨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‘大思政课’我们要善用之”。从“思政课”到“大思政课”表面上仅一字之差，实质上是对办好思政课理念的再更新，视野的再开阔，格局的再拓展。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《全面推进“大思政课”建设的工作方案》指出，“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，不断增强针对性、提高有效性，实现入脑入心”，为讲好用好新时代“大思政课”指明了方向。

回应学生关切，讲好“理论大课”。课程育人应切实提高课程质量，聚焦“大思政课”的“课程”属性，坚持用好思政课课堂教学主渠道。目前，思政课教学活动一定程度上还缺乏多样性与灵活性设计，“大思政课”建设应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价值追求，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思想心理及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，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。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、思考的主体、收获的主体。注重给予学生更多的发展选择权，让学生在多样选择中培育创造性。

融通理论实践，讲好“实践大课”。对实践教学认识不足、重视不够是制约“大思政课”发展的重要问题。新时代“大思政课”视域下的实践教学，不能简化为学生社会实践，忽视引导学生挖掘实践过程中的育人价值，背离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育人目标。也不能固化为“任务式实践教学”，完成课程“规定动作”，导致思政课实践教学

陷入模式化的形式主义窠臼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：“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”。实践教学是思政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。“大思政课”是“行走”的思政课，要按照学习的规律来设计实践环节，将实践环节纳入课程体系，增强实践在教育中的分量，构建符合科学性、体现先进性、彰显时代性的实践教学。

活用社会资源，讲好“时代大课”。坚持开门办思政需要宽广的视野，如“新质生产力”“未来产业”“人工智能+”等贴近时代脉搏，紧扣社会现实的内容，都是思政课的重要素材。如果局限于校园一地一隅，则不利于将社会资源优势转化为育人动能。“大思政课”超越传统“理论小课堂”，需要结合世界之变、时代之变、历史之变，用现实的力量把党的创新理论讲透彻。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、突出实践导向，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用于学校思政课、课程思政和日常思政教育活动。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，坚持开门办思政，让思政课与现实紧密结合，真正与时代同频共振。

突出课程建设，立体化融入“小学—大学”全过程。推动课程高质量发展。坚持将课程内容往“深”里挖，坚持用学术支撑政治、以知识承载价值，努力在政治引导、学理阐释和价值塑造上下功夫。坚持将课程范围向“广”处延，突破“专业视域”和“知识视域”

局限，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，让专业课程展现“思政味道”，形成从“思政课程”到“课程思政”的圈层效应。充分利用学校档案馆、校史馆和校友会等资源，结合学生年级特点，开发彰显地域文化和学校特色的“标志性”思政大课，建强思政课程群。

努力探索建立思政课大中小学衔接的一体化课程体系。加强大中小学教学元素纵向衔接、螺旋上升原则，逐步实现学段纵向衔接、逐层递进。发挥高校学科资源和大中小学团队优势，支撑一体化教学研究，编制教育教学大纲和教学指南，纵向衔接大中小学，强化各学段之间的连接，真正实现一盘棋统筹“大思政课”。

强化实践育人，多领域嵌入“理论—实践”全体验。统筹校内院系“大思政课”实践基地力量。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实践教学，开展思想政治理论社会实践。邀请资深教师指导完善实践教学方案，青年教师参与组织学生实践活动，推动实现教师全参与，学生全覆盖教学模式，探索实现学生实践“可记录、可评价、可测量、可呈现”的全链条工作体系，引导学生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。比如北京高校结合实际，科学参考实践基地示范教学课程，在实践教学教学中讲好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故事，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上的生动实践。跟随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接听即办工

头、企业车间、科研基地等地方“踩泥土”“闻烟火”，引领学生在实践中锻炼本领，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学思践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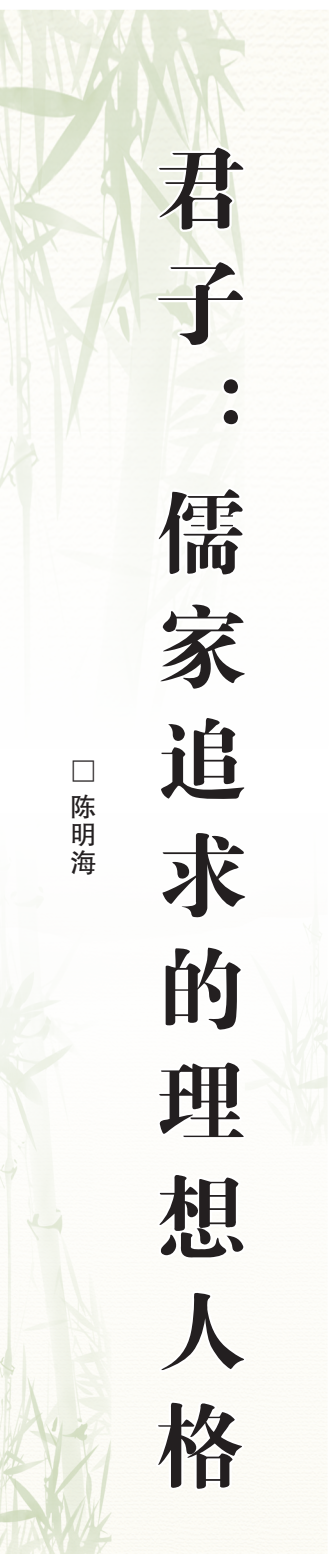
拓展工作格局，融媒态浸入“课内—课外”全方位。用好数字化技术，搭建课程建设平台。将数字化教育优势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发展的强大势能，构筑大思政育人格局，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。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教学深度融合，广泛搭建思想政治教育平台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共建共享。新时代“大思政课”要充分利用网络阵地，开拓思想政治教育空间，创新网络宣传形式，持续推动网络“最大变量”向助力思想政治教育“最大增量”转化。充分借鉴一线教学过程积累的学生易接受语言风格和表达形式，编写系列“微故事”，实现硬理论的软传播，促进课内育人向课外育人延伸。结合学校办学特色，录制系列“微视频”，构建由学生和他们喜爱的教师、知名校友、领军学者等组成的传播链，扩大育人作品辐射力。

对于理想人格，若把它置放到伦理学的场域中来考量，其指的是一定的道德理想，也指某种最高的道德范例或典型，它以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作基础，是这种原则和规范的集中体现。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，那么理想人格就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。“君子”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元素，儒家文化塑造的最有代表性的理想人格范式即为“君子”，“君子人格”当然也成为儒家核心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孔子是君子人格的首要建构者，对于君子人格有详细的阐释，并且他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希望于“君子”，期待他们承担起纯洁社会复兴国家的历史重任。“君子”在儒家文化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，更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。

“君子”是“仁智勇”内在品格的笃实涵养者。儒家认为，君子必仁，小人必不仁。无论是人际交往，还是行为处事，君子都应常怀敬畏之心，都需仁德宽厚、虚怀若谷。在儒家看来，君子还必须是一个智者，这种品格主要是在知识中不断涵养的。儒家非常重视对于知识的获取和掌握，孔子就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，是终身学习终身成长的典范。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，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”。正是在持续的学习积累中，孔子逐步得到提高，从而达到“从心所欲”“无大过”的君子境域。在儒家文化的视域中，“勇”也是“君子”必备的内在品质。孔子多次提到“勇”：“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”“勇而不计难，仁者不穷约，智者不失时，义者不绝世”“巧而好度必攻，勇而好问必胜，智而好谋必成”，君子是儒生，也是勇者。君子不同流合污，不向权贵屈服，不为利益奴化。虽然重视生命，但是为了恪守道义，捍卫真理，必须做到不屈不挠，勇毅前行，这就是君子之勇。作为君子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时时处处都需做“仁智勇”的笃实涵养者和忠实实践者。

“君子”是独立守正精神的坚定秉持者。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，独立的人格是君子最具代表性的精神内核。孔子曾谈及“六本”：“行身有六本，本立焉，然后为君子。立体有义矣，而孝为本；处丧有礼矣，而哀为本；战阵有队矣，而勇为本；政治有理矣，而能为本；居国有礼矣，而嗣为本；生才有时矣，而力为本。置本不固，无务丰末；亲戚不睦，无务外交；事无始终，无务多业；闻记不言，无务多谈；比近不说，无务修远。是以反本修迩，君子之道也。”这个“六本”就是君子处世行事之道，君子独立人格的构建也必须以“六本”为基础，能悟透“六本”，掌握“六本”，践行“六本”，则君子的独立精神就能得以外化。孔子还说：“不然，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”在王孙贾问孔子：“与其媚于奥，宁媚于灶，何谓也”时，孔子给予了上述答复。由此观之，儒家思想要表达的是，我们只是依照天理在行事，既不靠拜大王，也不靠拜灶王，君子应该有独立的人格，不搞人身依附，也无需找靠山。

儒家同时认为，君子不仅要有独立人格，而且必须守正，守正是君子立身的根本。守正肇始于修身而传达于天下，守正是君子道德追求的内在必然要求。君子之德在于心正，心正则德正，德正则人正，人正则行正，所以儒家强调“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。身有所忿懣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



□ 陈明海

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谓修身在正其心”。因此，君子守正必先守心，只有把心守好，才能真正做到守正；只有做到守正，才能做到言之有度，行之有法，才能做到自我监督，自我约束，自我管理。

“君子”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真诚担当者。在儒家文化的境域中，君子身上都彰显出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情怀和历史使命感。在强调人格独立的基础上，儒家先哲进一步认识到人是社会中人，人应在社会中生活。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”君子不可以不弘大而刚毅，因为责任重大，路途遥远。“长沮、桀溺耦而耕，……曰：‘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且与其从辟人之士也，岂若从辟世之士哉？’” 纘而不辍。……夫子欣然曰：‘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’”作为君子，理应以安民济众为己任，即使身在江湖，也依然心存魏阙，总难忘情于国家大事，总与政治相关联，这是儒学传统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特征之一，更是君子伟大人格的体现。

梁启超曾言：“吸收新文明，改良我社会，促进我政治……深愿及此时机，崇德修学，勉为真君子，异日出膺大任”，君子应带动“国民之人格，戛戛日上乎”。儒家的理想人格完美体现了品格、人格与天下己任之间的内在理性逻辑，追求实现自我完善、社会发展和国家昌盛，这在当下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。通过对儒家理想人格的认知、理解和应用，可以更好地提升自身道德素养，融洽社会关系，积极投身国家建设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